



邵云环 1951 年 6 月 19 日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华社参编部主任编辑，历任俄罗斯东欧编辑室副主任和《参考消息》二编室副主任，1999 年 3 月奉派任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分社记者，同年 5 月 7 日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中以身殉职，年仅 48 岁。

邵云环同志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1971 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塞尔维亚语，1975 年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参编部，先后在翻译、选报、编辑和记者岗位上工作。1990——1993 年期间首次赴贝尔格莱德分社任记者，1999 年 3 月，她又主动请缨奔赴南斯拉夫报道第一线。她以中国新闻记者的正义与勇敢，真实地报道了北约空袭南斯拉夫的事实真相。

国务院有关部门已批准邵云环同志为革命烈士。

一位无畏而尽职的女记者

——记新华社记者邵云环

詹得雄

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分社记者邵云环，在 5 月 7 日午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五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击中国大使馆时，不幸以身殉职，壮烈牺牲。噩耗传来，我们《参考消息》报社长期与她共事的同志，莫不悲痛万分，对北约的野蛮暴行义愤填膺，怒火中烧！

邵云环同志是一位热情开朗、勤奋踏实、德才兼备的好同志、好编辑、好记者。她 1951 年 6 月出生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曾是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建工处的工人。艰苦的环境和平凡的劳动养成了她大山的筋骨和松树风格。

1971 年她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塞尔维亚文。她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博得了老师与同学的一致好评。1975 年 2 月，她被分配到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工作。那是一个为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站岗放哨、收集瞬息万变的国际动态新闻的重要部门。她以高超的外语水平、敏锐的新闻敏感和坚定的政治方向，出色地同时也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在风雪交加的冬天，她凌晨就要赶到办公室选译外电外报，常常到深更半夜，还要校对散发油墨味的校样。她密切注视着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把每一个重大的动向及

时、客观、准确地向上反映，同时通过《参考消息》向全国人民介绍。

1990年9月，她奉派到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分社工作，目睹了南斯拉夫的分裂和波黑的激烈冲突。她为新华社采写了大量的新闻稿，也为《参考消息》撰写了许多有见地、有深度、有现场感的综述，发表在《来龙去脉》等栏目里，深受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1993年10月回国后，她担任俄罗斯东欧编辑室副主任，担子重了，她更忙了。1996年9月担任《参考消息》第二编辑室副主任，具体负责三版，即《时事纵横》版的编辑工作。她苦心经营，不断推出诸如《来龙去脉》、《历史一页》、《国际大特写》和《知识窗》等受读者喜爱的好栏目，很好地体现了《参考消息》“采四海风云、播五洲气象”的风格和特色。

今年3月正当南斯拉夫局势极其紧张、科索沃战火一触即发的时候，她主动请缨，要求到第一线去工作。记得3月12日她到办公室向《参考消息》编辑部的同事辞行的时候，脸带笑容，眼中流露出坚毅的目光。她说：“请大家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她一句也没有讲到个人的安危。当我们说“请多保重”时，她还是像平常那样微微一笑。

她到达贝尔格莱德不久，3月24日，北约的炸弹就破坏了那里的和平。她含着热泪写出她的第一篇通讯《悲壮的贝尔格莱德》。她写出南斯拉夫人民的悲愤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读她的文字，很容易想到她的性格和为人。百忙之中，她还曾打回过电话问大家好。我们嘱她保重，她却说：“我最怕的是稿件发不出去。”

此后，她在完成大量新闻报道任务的同时，还陆续写了三篇通讯，发表在4月13日、27日和5月7日的《参考消息》报上，它们分别是《北约空袭南联盟亲历》、《在血与火中所见所闻》和《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现在重读这三篇通讯，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浩浩正气和对南人民的由衷钦佩与同情。

读她的通讯我们知道，在她工作的地方，爆炸“几乎把人从床上震起来”，“别人听到警报可以按规定到地下室躲避，我却得硬着头皮呆在屋子里写稿子”；我们知道，她到大桥上和工厂里去采访“人体盾牌”，人们在唱歌跳舞，“那场面与其说是欢乐不如说是悲壮”；我们知道，她“抽时间用摄像机把贝市一些可能遭轰炸的设施拍了下来”，没几天，许多设施果真炸毁了；我们知道，她去采访被炸后的塞尔维亚社会党总部，看见“从中间几层已被炸碎了的玻璃窗户里伸出几面南斯拉夫国旗，在雨后的微风中缓缓飘动……”

在她最后一篇遗作中，她写道：“一个多月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常常在午夜以后响起的爆炸声，每天晚上就像‘等楼上的另一只靴子掉下来’一样等待那一声令人心悸的巨响。”我们读着她的震撼人心的通讯，为她的安全时刻捏一把汗，只能默默地为她祝福。

即便这样，当我们得知她在电脑旁工作时遇难的消息后，仍然万分震惊，不敢相信。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好翻译、好编辑、好记者、好战友、好党员而悲痛万分。邵云环同志以她 48 年的生命谱写了一部壮烈的人生史诗。她没有走，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原载《参考消息》报 1999 年 5 月 10 日）

北约空袭南联盟亲历

邵云环

来到贝尔格莱德后，北约的空袭就开始了。

北约从 4 日开始轰炸贝市市中心的重要设施，几乎每天一个目标。爆炸声听起来的确让人心颤。对距我们大约四公里远的空军司令部的那次轰炸，几乎把人从床上震起来。经历了十几天的炮火，现在我们已能大概分清哪个是北约炸弹的声音，哪个是南军的防空导弹的声音了。

南联盟大厦（南政府机构大楼，已被北约确定为轰炸目标）离使馆很近，大约只有一公里远。如果被炸，我们也许会受些影响，只希望北约的巡航导弹“精确制导”。不过前几天炸的地方我们都看到了，不得不让人惊叹现代化武器真是“指哪打哪儿”。据说有的炸弹炸下来建筑物被毁却不起火，只冒些许烟，真有些“杀人不见血”的味道。我们这间卧室的窗子正对着联盟大厦的侧楼。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把卧室里的桌子加电脑一起移到了客厅——多隔一堵墙心里要踏实些。此外把所有的玻璃窗都用胶条贴上了歪歪扭扭的“米”字。生活规律也打乱了，分不出白天黑夜，睡觉经常是和衣躺下。头几天听到空袭警报还有些紧张，现在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别人听到警报声可以按规定到地下室躲避，我却得硬着头皮呆在屋里写稿子。

其实这种胆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了当地人的影响。塞尔维亚这个民族让你不能不由衷地佩服。也许人被逼到了绝境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大多数南斯拉夫人现在听到空袭警报后根本就不去地下室了。他们说：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八年前我第一次到分社工作时虽然也经历过前南斯拉夫的波黑战争，但那次战争毕竟不是发生在贝尔格莱德。

“人体盾牌”这个词，过去写波黑的稿子时我曾给读者介绍过，现在它就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通常，北约一般在晚上或凌晨时分进行轰炸，可现在从夜幕刚一降临直至午夜，距使馆三公里远的“布兰科”大桥上，男女老幼每天斗志不减地在桥上唱歌跳舞高呼口号。我去过一次，那场面与其说是欢乐不如说是悲壮。

他们不会不知道，就在 9 日凌晨，位于另外一座城市的百年老厂“旗帜”汽车厂遇到了北约的轰炸。当时被炸伤的 124 人，都是从空袭一开始就自愿守卫工厂的“人体盾牌”。那天晚上，工厂领导曾苦苦劝他们离开但未成功。两小时后，北约的炸弹就落了下来。

工厂被炸的第二天，我随南联盟军事新闻中心组织的活动同其他外国记者一起前往距贝尔格莱德 200 多公里以外的那个城市，目睹了被炸得七零八落的车间和厂房，还有医院里受伤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

有时我想，不管损失有多大，假如毁掉的只是建设和设施，以后还有机会重新建设。可是要是人被炸死了呢？但可怜的塞尔维亚人正在默默地、顽强地抵抗着，孤军奋战着。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说那个“不”字。

前不久，我抽时间用摄像机把贝市一些可能遭轰炸的设施拍了下来，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它们就可能从人们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

从北约空袭的第三天开始，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共和国广场的反战音乐会一天也未曾停止过。当主办者在第一场音乐会上宣告“我们将一直唱到空袭停止那一天”时，我还有些怀疑。可是他们真的坚持下来了，而且参加者人数不减。没有特别的组织工作，直播电视上只是每天打出一行字：“贝尔格莱德的市民们，明天继续到广场来吧，让全世界看看我们！”那种群情激昂的场面，那种坚持不懈的劲头，如果不是亲历真是难以相信。现在这种音乐会已发展到全国各个城市。参加演出的艺术家们都是没有报酬的，但他们争先恐后，非常卖力气。

除了广场音乐会外，人民剧院每天都举办芭蕾舞、交响乐和民间舞蹈等演出。电视直播时我经常抽点时间欣赏一会儿。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可是对塞尔维亚人来说，却是一种抗争和对北约轰炸的蔑视。

许多人关注塞族人的民族特性可以说是从波黑战争开始的，我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很难用“顽强固执”、“宁折不弯”等词说得清的特性。的确，历史上的塞族人从没有屈服过。他们看重民族尊严，追求自由，哪怕明明知道没有赢的希望。在以强凌弱的当今世界，这也许正是塞族人的悲剧所在。不少人感慨：为什么非要说“不”呢？如果，顺从一些，局势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可南斯拉夫人却自有一番解释：我们错就错在我们处于一个极其敏感的地缘政治区域内，反正“怎么都是错”。这种被逼入绝境后表现得更加充分的民族特性，也许正是一些西方大国没有估计到的。

(1999 年 4 月 11 日发自贝尔格莱德)

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

邵云环

5 月 2 日晚，北约用石墨炸弹袭击了塞尔维亚的高压电网，造成整个供电系统瘫痪。塞尔维亚大部分地区突然断电。“白色的城市”（贝尔格莱德）自空袭以来第一次度过了没有灯光的黑夜。

这一天正是月圆之时。站在楼顶举目望去，一轮明月正从不远处被炸成空架的商业办公楼后面冉冉升起。这一晚贝尔格莱德市区没有听到爆炸声。望着沐浴在淡淡月光之下的漆黑的城市轮廓，我心中不由陡增一种恐怖感：三个被俘的美国兵刚刚离境，北约就下此毒手，它给人们发出的是一种什么信号？

最近以来，北约飞机空袭中的“失误”越来越多了。4 月 27 日，四架北约飞机在只有 1.3 万人口的苏尔杜里察上空盘旋数分

钟后投下了大约 20 枚炸弹 其中 6 枚落在了居民家。据前往采访的记者们描述，小镇里数百座民房化作了废墟，20 多人死无完尸。血肉浸进泥土，情景惨不忍睹。

5 月 1 日中午，一颗北约导弹击中了科索沃卢扎内市一座桥梁上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汽车车体被拦腰截断，其中一半栽入河水中 造成了 47 人死亡、10 多人受伤的悲惨后果。

5 月 3 日，北约飞机用集束炸弹袭击了一辆从贾科维察开往波德戈里察的公共汽车，不仅造成乘客而且造成前来救援的警察的伤亡，目前已发现了 17 具尸体。

可是，北约在解释这些血淋淋的事件时，往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偏离了军事目标”或“不可避免的失误”。

不仅如此，北约的轰炸还有了新的战术。

一个多月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常常在午夜以后响起的爆炸声，每天晚上就像“等楼上的另一只靴子掉下来”一样等待那一声令人心悸的巨响。

一般来说，在贝尔格莱德市区，北约往往在“精确地”炸毁一个目标后，便会完成任务般打道回府了。可自 4 月 29 日起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天晚上从 10 点多开始直至次日清晨，飞机的轰鸣声、导弹的爆炸声和防空炮火声彻夜未停。那一天北约不仅轰炸了市中心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大楼等建筑，而且还在短时间内对这些目标进行了二次轰炸。一些消防人员和救护人员就在这二次轰炸中受伤或遇难。

可以说自空袭以来每次爆炸声响起，我的心都会被揪紧一次。塞尔维亚电视台被炸以后，十多名死去的新闻界同行陆续被从废墟中挖出，这在我的心里成了一道抹不去的沉重阴影。随着北约轰炸“失误”次数的增加，每天在布兰科大桥上以人体盾牌参加护桥的人们的命运不能不令人感到担忧。

在加紧对南联盟空袭的同时，北约还在施展一种心理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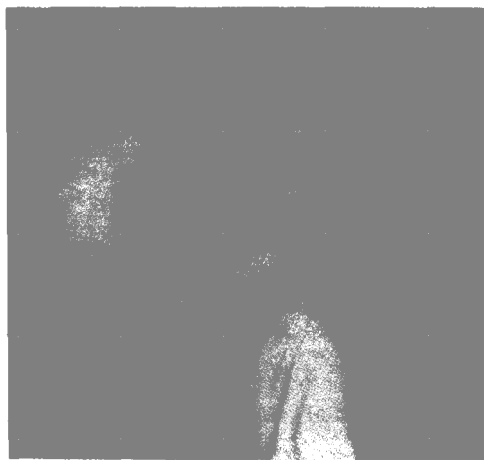
鼓动南斯拉夫人民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它们通常是一张张印刷考究的小传单。正面是几行令人心悸的黑色美术字：没有汽油，没有电，没有自由，也没有未来；背面则有一段问话：你还要为米洛舍维奇受苦到何时？

长时间生活在没有规律的惊恐和不安中，大家都感到身心极度疲惫，甚至笑自己得了“科索沃战争综合症”。然而我们毕竟是外国人。作为真正受害的当地人，他们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南联盟境内多瑙河和萨瓦河上的主要大桥几乎都被北约摧毁，而贝尔格莱德的几座大桥也危在旦夕。乘出租车时，听说要从老城到新城去，我已三次被拒载，理由都是那要经过布兰科大桥；而每次经过这座大桥时，司机往往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大油门。一位出租车司机曾对我说，我们害怕过桥，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向北约说“YES”，北约已经把我们炸成这个样子，我们还有退路可走吗？

尽管大国间不紧不慢的外交斡旋一次又一次地把人们的希望变成失望，北约在加大空袭力度的同时也加强了心理战术，但仍未有迹象表明塞尔维亚人会在强大的压力下向北约投降。在经过了没有灯光的漫长黑夜后，阳光又把人们领进了正常生活中。多瑙河边风格迥异的小餐厅和咖啡馆里仍然高朋满座，散步的人们依旧缓行。

(1999年 5月 6日发自贝尔格莱德)



马玲 六十年代生于北京。幼时，中华大地东南西北奔波，中学时落脚北京。大学，入读外语学院，专攻日本文学。曾有多部短篇小说面世。出大学门后，做过翻译，当过记者，搞过商务。曾公费留学日本京都大学，研修社会学。

后入香港《大公报》，任驻京高级记者。其间因独家报道及对政要人物的专访，获九四、九五年度大公新闻奖。1996年获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二届优秀新闻作品奖。1997年调《大公报》香港总部工作，报道了香港回归交接仪式。

“爆炸”新闻带来爆炸效应

马 玲

1995 年 2 月 7 日,《大公报》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套红大标题登出《中国发射卫星失败真相大白,美制卫星再次爆炸耐人寻味》的独家新闻,电头为“本报记者马玲北京 2 月 6 日专电”。报纸一出版,迅即在香港和海外引起一场新的“爆炸”。

一早,香港的电视新闻便频频映出《大公报》的此一报道。旋即,不仅香港的媒体热闹起来,世界各大通讯社也纷纷转发或评议。几天后,当我与航天系统的新闻发言人联系时,得知:“你这篇报道一下子就震动了世界,在此之前,那么多文章指责我们的失败,现在态度一下子就转了过来。”这位发言人还透露,仅第一天就接到 20 多个记者的电话,其中路透社和法新社最先找上门,甚至半夜三点还有境外记者把电话打到她家中。

报道明确指出:诸多实据表明,1 月 26 日中国用“长二捆”火箭在西昌发射美制卫星的失败,卫星爆炸在先,火箭引爆在后,事故系美方生产的卫星所致。此次爆炸与 92 年底发射澳星事故颇为相似。有专家对两次事故进行分析后认为,不能排除事故出自有意而为的可能性。

报摊上的《大公报》很快被抢购一空。

其实,我得到的这一“爆炸”消息,并非来自官方,我始终以职业操守为准保护着消息来源。

中国生产的“长二捆”火箭,先后两次发射美制的卫星,于

92 年底和 95 年初竟然两次发生莫名其妙的爆炸。第一次爆炸后，双方虽进行了长时期调查，最后的结果却不了了之；此次，又面临着与前次一样的微妙局面。海外传媒的报道对中国很不利，一味责怪中国技术不过关。已出现有些同中国签有发射合同的国家意欲取消合同。我获悉，较知内情的中国航天界人士却对这两次事故憋了一肚子委屈。

于是我披露了一些真相，但没有想到反响竟是如此强烈。

那些天，认识我的港台及国外驻京记者纷纷找我追踪进一步消息；不认识我的记者就另寻途径跟进；承接发射美制卫星的中国驻香港的亚太公司找我及《大公报》，认为报道确实让中国人出了冤气，但他们担心报道会影响事故后的赔付；美方的卫星生产厂家休斯公司也从美国和香港打电话到处了解我的背景和消息来源……

每周的外交部记者例会，原本都是我去，但此次北京办事处主任考虑到我可能成为问题的中心，故让我回避，另派了记者去。果然有几位记者问到此事，外交部发言人回答的大意为：记者有自由报道的权利，相信《大公报》会尊重事实。

恰巧，那段时间我应美国一家中文报纸的邀请，正在办理赴美的手续，考虑一番后，决定放弃美国之行。

为了更具说服力，《大公报》95 年 2 月 20 日，又在头版头条以套红通栏《美卫星空中爆炸连环镜头》为题，登出了四幅卫星爆炸在先的照片及航天专家的研究论说。同时还指出，美制卫星运抵西昌后，美方特别安排了十二名警卫日夜守护，不准中方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任何人员靠近。并进一步把中国发射卫星的失败经历与国外发射失败的经历列表对比。

国内的《参考消息》和《报刊文摘》等刊物，亦对上述两次报道予以全部或部分转载。

休斯公司亚太区总裁，在香港接受电视及报刊的采访时调整

了表态：卫星发射失败不会影响该公司对中国发射服务的信心；在卫星上很难安装预防无线电遥控的东西，但是难以想象有人会这样做，我认为那是幻想。

与此同时，《大公报》还收到了署名“中国航天人”的一份传真。传真写道：“当九五年元月二十六日中国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和美制卫星在西昌上空爆炸时，一时间，世人有深感震惊的，有痛感惋惜的，有讥讽嘲笑的，也有幸灾乐祸的……尤其西方的新闻媒体，大造舆论。据说，当天有的西方电视台竟每隔十五分钟就播放一次中国火箭爆炸的场面，唯恐天下不知道中国又“出丑”了，其用心是何其良苦！……我们航天人一致认为你们的报道和评论写得好。好就好在文章如炮弹一样在全世界打响。……请接受我们航天人向你们致以由衷的谢意！”

此“爆炸”新闻及其后的几篇独家新闻见报后，海外有报刊撰文认为“《大公报》这两年冒出来一个很能干的驻京记者马玲…神通广大，颇有来头…”并称我为“突然闯出来的一匹黑马。”

1997年9月25日

中国发射卫星失败真相大白 美制卫星再次失败耐人寻味

马 玲

据悉，上月二十六日清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二捆”火箭发射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亚太二号通讯卫星发生爆炸的原因业已基本查清，诸多实据表明：卫星爆炸在先，火箭引爆在后，发

射失败的责任系美方生产的卫星所致。另据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九二年十二月发生的休斯公司生产的另一枚卫星——澳星的发射事故颇为相似。在专家对两次事故进行分析后认为，不能排除事故出自有意而为的可能性。

一月二十六日清晨六时四十分，由长征二号 E 型火箭运载的亚太二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五十一秒时星箭均发生爆炸，引起世人对中国航天开发前景的强烈关注。时至今日，经过专家学者的大量调查、分析和考证，失败原因终于得以明晰，卫星的爆炸引发了火箭的爆炸，完全由美方生产的卫星所造成，其依据主要源于图像、数据、黑匣子这三个方面的真实记录。

一、从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实况图像和发射中心自拍的图像上看，火箭的起火点首先是顶部，即末级火箭和卫星的结合部位先冒火，表明故障点来自此处。卫星仓里的卫星是休斯公司生产的，而末级火箭的主要部分也是美国人完成的；二、从地面中国卫星测控站收到的卫星监测数据看，七秒钟时，卫星数据首先消失，四十九秒至五十一秒时，火箭才自毁，而后彻底收不到信号。这就只有当事者最清楚了。

以火箭发射卫星属世界尖端科技，中国得以步入国际卫星发射行列，是这个大国崛起的一个明证，但是中国的进步与发展，难免不触及一些既得利益国的神经，出于政治和经济诸方面的考虑，在国际航天舞台上对中国以火箭发射卫星的能力及信誉进行挑畔和破坏，也不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据说，美方在得知中方的调查结果后，表示还将进行进一步分析，目前尚难预测美国最后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但是人们相信，事实最终是会战胜一切的。



元元 原名刘元元，1969年7月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做过一段短暂的翻译工作之后，1994年调入北京电视台。曾任《北京您早》新闻记者兼主持人，《点点工作室》制片人兼主持人。1998年3月，在《北京您早》节目中创立了以本人名字命名的新闻评论节目《元元说话》，该节目以贴近百姓，敢于揭露时弊，犀利诙谐的特色很快赢得了观众好评。元元的主持风格是亲切朴实，快人快语，精练、流畅、尖锐而风趣的语言是其最大的特色。电视新闻《外地人“卷”走了100亿》，获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二届优秀新闻作品奖。

元元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是北京作家协会会员，1995年出版散文专集《20岁进行时》。

说话真难

元 元

今年三月，我主持的节目有了一个新名字：《元元说话》。人们会想：话人人都会说，这有什么难的？但短短的几个月下来，我的感觉却是：说话真难！怎样才能把话说对了，说好了，说到点儿上，说得不俗，几乎已经成了我苦苦追求的境界。在赞扬的时候，我希望我的话是火，热情而昂扬；在批驳的时候，我希望我的话是刀，快、准，而且有锋芒。

元元是谁？她代表谁在说话？她在说什么？——节目开播之后，这种惶惶不安一直在折磨着我。我很怕自己不能承担好这一角色，很怕给人那种“乳臭未干就指点江山”的浅薄之感。因此每一期节目的背后，往往都是“语不惊人誓不休”般的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我渐渐地感到：观众对我的节目多了一种期待：他们不单单关注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什么事，而且还在关注我要对这件事发表什么议论。

但说话是有风险的，对此一位老记者曾经有言在先，他说：“只有这种‘小毛丫头’才会这么‘不知死活’”

其实生活中的我并不爱说话，可说话却偏偏成了我的职业，还是以“嘴巴厉害”而著称。这或许说明，屏幕上的元元，代表的不仅仅是我本人。如果说观众从这个女记者身上看到了一些“聪明、

大胆、直率”等可贵之处，那是因为，有二十多位记者在给她智慧，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在给她力量。

有人真爱这个栏目，也有人真恨这个栏目。在采访中有夺机器的，有打记者的，有告黑状的，有打官司的，还有隔三岔五来办公室纠缠不休的……但广大观众是以最淳朴的语言和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情。一位老阿姨曾写信给我，嘱咐我：“尽揭露坏人坏事了，可得小心坏人报复！”末了她还问我：“你有孩子了吗？你要是太忙，我来帮你照看！”一句话感动得我几乎落泪，我在回信中说：“我在这边儿给您鞠躬了——阿姨，您真好！”这回，我想不出太多的词汇来表达，我才知道，情到深处，也是“无话可说”。

1998年 9月